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Tea Road and Nomads
18-19 October 2019**

**Ulaanbaatar
2019**

Editor: AYUDAI OCHIR (Sc.D)

The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madic Civilizations

P.O.20A, 7th Floor, bldg. Soyol Tov Urguu,
Eronkhii Said Amar street,
Sukhbaatar Sq.3,
210620A Ulaanbaatar,
Mongolia

Tel: 976-11-329624

976-11-315100

www.nomadic.mn

E-mail: nomciv@magicnet.mn

HHА

ДAA

N-.....

ISBN:

.....
.....

This work with all its parts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by reviewers, who may quote brief passages in a review.

Formatting and layout: D.Naranbaatar

Compiled by: N.Ganbat

English Translator: M.Naranchimeg

G.Gansukh

Printed by: "....." Printing Press, Ulaanbaatar, 2019

PRINTED IN MONGOLIA

CONTENTS

Foreword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ea Road and the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 were held

Opening Ceremony

S.Uyanga.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Mongolian National Commission of UNESCO

A.OCHIR (MONGOLIA)
“The Tea Road and Mongolia”

RAMIL KHAIRUTDINOV
.....

RAFAEL VALEEV
.....

IZMAILOV ISKANDER LERUNOVICH (RUSSIA)
“Trade Roads in the Volga Region: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Modern Time”

CHEN WEI (CHINA)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Exchange on the Path of Modern Tea Road”

VAANCHIG (CHINA)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long the Tea Road Promo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BADARAEV DAMDIN DORZHIEVICH (RUSSIA)
“The Mongolian Economic Corridor as Revitalization of Great Tea Road”

B.DAVAATSEREN (MONGOLIA)
“Policy Planning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ngolian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Tea Road”

SATO NORIYUKI (JAPAN)

**“On the Tea Routes by Chinese Merchants
During Qing Mongolia”**

D.BAZARDORJ (MONGOLIA)

**“The Tea Road and Da Shen Kui firm
(Daashinkhuu Puus) in Outer Mongolia”**

HUANG XING (CHINA)

**“Research on the Iron Smelting Technology in
Song and Liao period”**

M.DAGVADORJ (MONGOLIA)

**“About the Long Folk Song Heritage
along the Tea Road”**

CHEN PU (CHINA)

**“The Influence of Tea Trade on Tea
Making Technology”**

N.GANBAT (MONGOLIA)

**“Tea Ceremony in Some Nor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Comparison”**
(case study of Mongolia, China, Russia, and Japan)

NARS (CHINA)

“The Tea Road and Mongolian Tea Culture”

SVETLANA KIRICHENKO (RUSSIA)

MARINA BALDANO (RUSSIA)

**“The Great Tea Road: History of
Formation and Possibilities of Rebirth”**

WEI YI (CHINA)

**“Sangluokan village: Mongolian Regiment at
Drepung Monastery”**

L.PUREVLKHAM (MONGOLIA)

**“Some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Immovable
Heritage Related to the Tea Road Period”**

TSETSENT (CHINA)

**“The Past & Present State of Belt and Road:
About the Trade Trends of China and Mongolia”**

CH.TUULTSETSEG (MONGOLIA)

G.BAYARMAA (MONGOLIA)

**“The Collections Related to the Tea Roa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Mongolia”**

LI YANYANG (CHINA)

“Inner Mongolian Great Tea Road and Important Remains”

B.RINCHINNOROV (MONGOLIA)

P.CHULTEMSUREN (MONGOLIA)

**“About the Evidences Related to the History of the Tea Road,
Stored in the National Central Archive”**

现代茶叶之路沿线的科技交流：略述中蒙科学院交流史

的第一阶段（1949-1966）

陈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chenwei@ihns.ac.cn

自古以来，中国与蒙古在包括科技在内的诸多方面有着丰富的文化交流互动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与蒙古国同属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而波动。在此背景之下，两国科技交流的紧密程度也受到影响。1991年苏联解体后，蒙古与中国之间的科学互动逐渐形成以两国科技发展需求为核心，兼及与周边国家紧密互动的特点，所涉及方面不断扩大，科研活动从地理、环境、地质、动植物、气象等自然科学合作研究逐渐深入到包括清洁能源、畜禽养殖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2019年是中蒙两国建交70周年，将作为两国高层次科技交流合作核心组织力量的两国科学院科技交流合作活动进行回顾，具有对现代茶叶之路沿线两个主要国家友好关系史做出总结，对未来更深入互动进行展望的重要意义。本文系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蒙古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合作项目“中蒙科学院合作交流史”的简要概括，尝试以中蒙两国科学院档案、两国所签署合作协议、报纸资料、研究所提供课题合作资料等史料为基础，简要划分两国科学院交流合作第一个阶段，即中国建国的前17年间中蒙科技合作的主要事件与成就，并初步总结各阶段科技合作的特点。

中蒙科学院科技交流的起始（1949-195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很快在原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并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蒙古科学院的前身蒙古科学与教育研究所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在正式建国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就公布“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指出中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革命胜利离不开苏联的援助，所以中国应站在苏联一方，与苏联站在同一战线上。而此时蒙古在乔巴山的领导下，同样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与苏联保持一致。在这个时期，中国与蒙古两国的科研基础都很薄弱，因此科技交流与合作大多是在苏联的组织下，作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来开展的。

中国科学院与蒙古科学与教育研究所当时均不仅包括科技研究机构，同时还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部门，一些文艺界人士也在科学院机构中发挥影响。1950年代双方在这些非科技领域的交流比科技领域要更多，且更实质性。除了在外交带动下的科学院人士互访，如1952年9-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周年前后，以周立波为团长的中国文艺代表团和以丁毅为团长的中国歌舞团赴蒙参加活动，受到蒙古文化科学艺术界的欢迎。10月4日，蒙古科学院举行座谈会，蒙古科学院院长、著名作家丹姆丁索龙等到会。¹1953年6月15日端午节这天，蒙

¹ “蒙古文化科学艺术界集会欢迎我文艺代表团”，《新华社新闻稿》

古科学院与蒙古保卫和平委员会联合召开了纪念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屈原逝世2230年的纪念会，在会上丹姆丁索龙发表讲话，纪念会还通过了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的贺电。²1954年7月31日，周恩来访问乌兰巴托，成为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外国政府首脑。次日也是中国的“八一”建军节，在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于上午11点举行的招待会上，蒙古科学委员会主席扎格瓦拉尔（1984年曾出任代理大人民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发表讲话。这些交往显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外交事务带动下的文化交流，与科研实践关系不大。

二、蒙苏中学者共同编纂《蒙古通史》（1956-1958）

在具体科研方面，1950年代中蒙合作最重要的事项当属1956-1958年中国学者参加蒙、中、苏三国历史学家合作编写蒙古通史。在这项规模较大的项目之前，中国与蒙古建交后不久，一些中国蒙古史学者就开始借助各种途径，尝试获取进修或合作机会。如1952年6月19日，中国科学院历史学者余元龠（1915-1961）曾给蒙古驻中国大使馆秘书Dalhjav写信表达要学习新蒙文。³余氏是当时活跃的蒙元史青年学者，当时曾关注蒙古推行新蒙文的语言学问题，⁴其著作多从蒙古民族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可惜英年早逝。1955年7月9日至9月25日，以侯外庐为团长的科学文化教育代表团在蒙古访问讲学，团员有著名蒙古史学者翁独健等。除乌兰巴托外，这个代表团还访问了包括中央、色楞格、布尔甘、北杭爱、南杭爱等五个省的一些主要城市，行程三千余里。⁵1956年6月至11月，当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蒙古学者伊西扎木茨（N. Ishjams）等在1952年签署的《蒙中经济及文化、教育合作协定》后经过扩展的教育合作关系支持下，访问了北京图书馆、档案馆等学术机构，并与侯外庐、刘大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以及其它六位学者见面。⁶

1956年11月13-19日，翁独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韩儒林（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北京大学历史系）等三位当时中国最杰出的蒙古史学者到乌兰巴托参加了蒙、中、苏历史学会议，研究合作编写蒙古史的问题。通过此次会议的事后报告，可以了解到此次会议讨论了蒙古通史的内容、三国学者如何分工负责撰写各个章节，以及1957年至1965年通史从筹备、编写到出版的进度安排。会议建议三国学者举行科学考察、考古调查、学术讨论会、资料交换、协助整理档案、培养学生、互相评阅著作、编印工作通报等合作活动。⁷根

，1952年10月，第267页。

² “蒙古人民纪念屈原”，《新华社新闻稿》，1953年6月，第505页。

³ 蒙古国立大学敖坦提供资料。

⁴ 余元龠，“斯大林论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和苏维埃学校的任务”，《科学通报》，1951年第1期。

⁵ 翁独健，“访蒙观感”，《世界知识》，1955年第22期，第30-32页。

⁶ Enkhchimeg Baatarkhuyag and Chih-yu Shih, “Surging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Legacies, Politics, and Turns of Sinology in Contemporary Mongolia”, *China Review*, 2014, 14(2): 37-57.

⁷ “1956年11月13日至19日在乌兰巴托举行的蒙苏中三国历史学家合

据会议讨论，1957年1月翁独健被指定为通史编辑委员会副总编辑。除此前参会的三名学者外，另增补冯家昇（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哈丰阿（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余元盒三人为编委，余元盒为编辑委员会中方秘书。⁸这个编委会在1957年2月16日曾就编写工作进行了讨论。⁹为此，在中蒙两国政府拟定的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中，蒙古史成为科学合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余还有根据需要与可能相互邀请科学家参加学术会议、蒙方邀请中国语言学家参加1957年蒙古语学术会议、中方邀请蒙方农牧专家来访等3项）。¹⁰

1957年10月21日，苏联科学院第一秘书长Topchiev给郭沫若来信，希望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继续讨论蒙古通史。此次会议于12月9日召开。我们还不清楚中国学者参加这次会议的细节，但这次会议上各方学者的合作有可能出现了一些波折。因为不久苏联和中国高层几乎同时表示要退出此项目。1958年蒙古科学院院长访华时，与夏衍等会谈时，夏衍表示中国学者并不适宜参加蒙古通史的编纂。而此时苏联学者也已退出。1958年6月19日策伯格米德致信郭沫若表示仍希望中国学者参与蒙古通史研究，为给中蒙未来合作留下余地，郭沫若在回信中表示中方仍乐于为通史编纂提供必要的史料。¹¹尽管苏联与中国学者退出了通史编纂，但在蒙古学者主导、苏联史学思想指导下，最终依然在1965年出版《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此书编纂过程曲折的细节，以及最终结果与最初商定编纂计划与思想之比较，是未来中蒙学术交流史上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蒙古通史编纂的中断并没有阻碍中国的蒙古学学者参加学术交流活动。1959年9月1-7日，翁独健、耿浦、额尔嘎陶克陶、清格尔泰、黄宗钱等中国学者到乌兰巴托参加第一届国际蒙古学家会议，并作会议报告。由于中蒙关系在1960年代后期中断，中国大陆学者并没有派团参加分别于1970年、1976年举行的第二、三届蒙古学学者会议。¹²

三、自然科学领域的交流（1956-1966）

除编纂蒙古通史外，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蒙学者基本是在苏联科学界的领导下开展交流。其中在日后形成一些影响的，是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

作编写三卷本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工作会议的决议”，中国科学院档案，1959-04-021-33；“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参加蒙中苏三国历史学家合编蒙古史会议的总结报告”，1956年12月30日，1959-04-010-15。

⁸郭沫若致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札格巴拉勒主席函，中国科学院档案，1959-04-021-31。

⁹“蒙古通史编辑委员会中国编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蒙古科学院档案。

¹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1957年文化合作计划”，中国科学院档案，1956-04-010-01。

¹¹

¹²中国蒙古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编，《三次国际蒙古学学者会议情况》，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1979年。

究所进行的。该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3月26日，会员囊括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在合作共建研究所协议签字仪式上，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彭桓武，以及赵忠尧等学者作为代表出席，而蒙方代表则有副总理Avarzed、科学院索德诺姆院士等。¹³

苏联政府为了显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团结，投入很大财力和人力组建联合所，不但建造了各种一流的加速器、脉冲反应堆、大型计算机等设备，而且调集了许多知名科学家参加该所的领导。该研究所对中国核物理学家开展国际研究、年轻学者在强烈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王淦昌曾在该研究所任2届副所长，他领导的课题组发现反 Σ 负超子是该所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周光召所作研究也得到国际学界的高度评价。从1956年到1965年中国宣布退出联合所之间，共陆续有约140名中国学者在这里参加实验室的研究工作。¹⁴当时索德诺姆等蒙古学者也在杜布纳研究所工作，目前尚没有对中国与蒙古学者在联合所内部的交往有所关注，但到1990年代已经成为蒙古科学院院长的索德诺姆，在致信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时，仍提起在联合所共事时的愉快时光。¹⁵

此外，中蒙学者还共同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如1955年12月1日至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科学学术会议——抗生素学会议上，蒙古学者亚利木彼尔与保加利亚、朝鲜、越南等国学者一道参加，除报告蒙古抗生素使用状况¹⁶外，还与其他代表一道于12月8日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接见。¹⁷1956年8月1日，第八届国际植物检疫及植物保护会议在北京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包括蒙古在内的12个国家的代表。¹⁸

顺应国际科学活动的开展，中蒙之间的科学资料交换与共享工作也得到推进。1956年9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曾向蒙古科学委员会致信邀请后者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1957-1958，竺可桢任中国委员会主席）活动。在11月2日的回信中，蒙古科学委员会主席扎格瓦拉尔提出蒙古政府决定参加此次活动，并将在两个观测点进行大气气压温度和风的气象观测，为此蒙方希望中国与之交换东经110°¹⁹双方在此领域相互存在需求，这也使得气象学成为1980年代中蒙科学界最早恢复联系的领域之一。

13 蒙古《真理报》，1956年3月29日。

14 吴岳良、刘金岩，“周光召对理论物理和原子能事业的贡献”，《物理》，2019年第5期，第295-300页。

15

16 中国科学院编，《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1955.12.1-6 学术部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74-584页。

17 “周总理接见参加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外宾”，《人民日报》，1955年12月9日。

18 “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植物保护局编辑《第八届国际植物检疫及植物保护会议文件选辑》，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年，第250-263页。

19 中国科学院档案，1956-04-052-10.

在与生产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1954年7月22日，中国和蒙古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蒙古实习工人在中国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条件协定》²⁰。1956年8月29日，中蒙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协定》²¹。此后到1960年初，以这两个协定为依据，中蒙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实现科技合作项目。到1960年5月底，中方向蒙方派遣了22项247名技术援助人员，接受蒙古实习生10项46人。在此基础上，为更好开展两国间的科技合作，中蒙两国于1960年5月31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协定》。1962年6月4日，在北京签订执行协定的《共同办法》，规定了科技合作的范围和办法。²²规定了科技合作的范围和办法，1961-1966中蒙执行机构共开了4次会议，并签订了相应的年度计划协定书。列入计划书的合作项目64项。中方承担54项（包括派遣技术援助专家42项，共631人）。蒙方承担10项（均系资料和种子）。中方承担的54项项目中，实际执行了51项（其中有3项延期至1967年执行，占应执行项目总数的94.4%），蒙方承担的协议项目在1966年底前执行了4项，占蒙方应执行总数的40%，中方根据已执行项目向蒙方派遣技术援助专家627名。

1961年5月24日，蒙古科学与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改称蒙古科学院。在此之前，蒙方计划选举包括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内的各兄弟国家科学院领导者为该院院士。5月18日，这则通知经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传达至中国科学院，要求大使馆于5月22日前提供郭沫若简历。经调查，其它兄弟国家相关人士均接受此项荣誉，中国科学院也拟同意蒙古要求。5月20日此项请示得到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无保留意见的批复。²³

在收到郭沫若简历后，蒙古科学院即于5月22日选举郭沫若为院士，并打电话至中国驻蒙大使馆通知。23日上午10点30分中国大使馆电话中国科学院，请后者为蒙古科学院成立拟定贺电。接到电话后，中国科学院对外联络局很快进行拟电、复核和签发程序。经过再三修改，于下午16点及时发出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敬爱的锡林迪布院长：

热烈地祝贺您当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长。

贵院选举我为正式院士，使我感到这不仅是我的个人的光荣，同时

20 毕·奥南，尼·岗巴特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国家关系历史编年 1949-2014》，北京、乌兰巴托，2014年，第20页。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 第5集 1956》，北京：法律出版社，1958年，第144-148页。

22 “蒙古-中国签订科学技术合作共同办法”，蒙古《真理报》，1962年6月6日。

23 中国科学院档案，1961-04-039-01.

也是对中国科学界 的鼓舞，在这里特向您和蒙古科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中蒙两国科学院兄弟般的友谊不断增长，并祝您在工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郭沫若

五、24，北京²⁴

郭沫若当选为蒙古科学院院士，体现了1949-1966年间中蒙科技交流进展的正常局面。1966年后由于中蒙联系中断，继任院长方毅（1979-1981年在任）和卢嘉锡（1981-1987年在任）均未获选蒙古科学院院士这一荣誉。直到1989年中蒙科学院重新恢复正常来往后，周光召、路甬祥和白春礼等历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才再次获选蒙古科学院外籍院士。

1949年至196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科技交流的第一阶段。在这17年间，两国的学术交流更多体现在人文等领域，但遗憾的是最重要的合作项目——蒙古通史联合编纂中途中断，其具体原因还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在自然科学领域，由于中国和蒙古于这一时期均处于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阶段，合作研究主要是作为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科技合作的一部分开展的，中国学者与蒙古学者在杜布纳研究所等学术机构有来往，但细节同样有待更多史料的发掘。中国在这一时期对蒙古进行的援助项目，取得了一定成就。1961年郭沫若当选为蒙古科学院院士，体现了中蒙外交关系的正常状态。

24 中国科学院档案，1961-04-039.